

闽南文化在马来西亚的双重特性与在地融合机制研究

张兰朱¹, 林中燕^{2,*}

¹ 闽江大学新华都商学院, 海南海口, 中国

² 闽江大学国际数字经济学院, 福建福州, 中国

*通讯作者

【摘要】 闽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分支, 伴随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贸往来以及闽南人的海外迁徙, 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孕育出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本文选取马来西亚作为主要案例, 解析闽南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途径及其当代意义。研究发现, 闽南文化在海外传播中呈现出一种“双重特性”: 既坚守乡族认同, 也善于融合异质文化。此特性使其成为连通中国与世界的关键纽带。在“一带一路”倡议与福建“世界闽南文化交流中心”这一建设背景下, 推动闽南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以及创新性发展, 已成为文化传承、区域合作与文明互鉴三者交织背景下的重要议题。

【关键词】 闽南文化; 马来西亚; 东南亚华侨; 文化传播; 文明互鉴

1. 引言

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分支, 闽南文化以闽南方言为载体, 具有“重乡崇祖, 团结拼搏, 开放包容”的海洋文化特性[1]。其中闽南文化在海外的传播, 以东南亚地区最为集中, 其演变极为丰富多样, 且互动情况十分活跃。据统计, 在东南亚拥有 1200 多万的闽籍华侨华人中, 绝大多数祖籍是闽南地区。他们于异域之地扎根生长, 将闽南文化的基因融入当地社会, 打造出别具一格的文化景观。

本文以马来西亚为例, 结合新加坡、印尼等地的情况, 探讨闽南文化在东南亚的发展过程、发展情况及其意义。集中研究马来西亚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因为马来西亚是闽南人的重要移居地; 另一方面因为在马来西亚闽南文化传承具有独特的“中间状态”, 这使得它既留存着深厚的原乡韵味, 又深度融入多元族群社会。这也为解析“世界的闽南文化”提供了具有代表性的范例。

2. 闽南文化的内涵特质与全球传播

2.1 闽南文化的“双重特性”

闽南文化具备“双重特性”, 一方面是坚守乡族认同, 另一方面是开放地融合不同的文化。这看起来相互矛盾的特性, 实际上是文化生存的智慧之选。而这种对立又统一的心理状态源于闽南处在边陲的位置以及海上贸易造成的两难处境: 一方面要通过效仿中原以消除“蛮荒”的自卑情绪, 另一方面能够以高度实用主义的开放姿态去应对异域

的商业机遇。这样矛盾统一的心理结构, 表现成为: 坚守中原正统是历史积淀形成的文化资本, 而对异域商业抱开放的态度则是场域规则变化下的策略调整[2]。

闽南文化的保守性表现为一种对于中原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态度和坚持。闽南语保留着隋唐时期的中原音韵特点, 闽南人的聚族而居的习惯, 儒家的思想观念以及从中原传来的神明信仰等, 这都属于唐宋时期的中原文化的传承[3]。因此这种文化保守主义, 使闽南人在长期的迁移过程中保持一种清晰的族群认同以及文化记忆。

同时, 闽南文化又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在历史上, 闽南地区长期与海外文化进行交流互动——中亚的伊斯兰教, 南亚的佛教, 西欧的基督教等都对闽南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开放特性, 来源于闽南人‘以海为田’的生产方式, 进而孕育出了‘好男子志向在四方’的开拓进取的精神。

2.2 传播路径: 从月港到马六甲

闽南文化走向世界的起点, 能够追溯至宋元时期的泉州刺桐港。当时泉州作为“东方第一大港”, 汇聚着来自万国的商人, 闽南人也随之扬帆起航, 漂洋过海。到了明代, 漳州月港开始崭露头角, 随着月港兴起的海上贸易活动, 让闽南人更进一步参与东西洋贸易。在清朝时期厦门被开辟成为商埠后, 该地成为闽南人奔赴海外的重要口岸。

在这条海上交通要道当中, 马六甲具有重要意义。马六甲作为沟通东西方贸易的关

键通道,自15世纪起就成为闽南商人十分重要的中转站。马来西亚的侨领颜天禄提出,闽南文化在马来西亚的传承及演变,充分展现出该文化在异域他乡所具有的顽强生命力以及适应性。从槟城的龙山堂到吉隆坡的陈氏书院,闽南的建筑,信仰,语言以及习俗在此生根发芽,并与当地文化相互交融且彼此渗透。

2.3 东南亚闽南人的分布格局

东南亚地区闽南人的分布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历史上闽南各府的移民迁出。总体而言,泉州府的人口主要移居到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檳城以及印度尼西亚等国;漳州府的人口主要集中在马来西亚马六甲,檳城和新加坡;而厦门由于是开放港口城市,所以它的移民的分布较广。

这种分布状况与殖民时期的经济分工也有密切关系。英国殖民者在马来西亚推行“分而治之”政策,把来自不同地方的华人安排到不同的行业当中[4]。闽南人由于较早来此,所以在商业,贸易,锡矿等方面占据重要地位,从而逐渐形成以方言群和地域为基础的社团网络,这些社团也成为闽南文化在外传播的重要载体。

3. 马来西亚: 闽南文化在东南亚的典型样本

3.1 历史脉络: 从檳城到吉隆坡

闽南人移居马来半岛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5世纪,当时在马六甲就已经有以闽南人作为主要成分的移民人口,并且同当地人通婚,从而产生一种“峇峇娘惹”的群体。“峇峇娘惹”的出现是闽南文化和马来文化的结合的产物:他们信奉的宗教以及所遵循的传统都带有明显的闽南印记,但是他们的语言、穿着打扮以及饮食等方面又都打上了浓厚的马来人的烙印,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侨居文化”。

十八世纪末,随着英国殖民者对檳城的开发,大批来自福建南部的人口移居檳城谋生,檳城也就成了闽南文化进入马六甲海峡的重要集散地。建于1906年的邱氏宗祠龙山堂是檳城最具代表性的闽南宗祠风格建筑,该建筑的石雕工艺上十分精湛,庙内的石柱,门窗和墙壁都雕刻有龙凤呈祥,海神庇佑等图案。这些石雕不仅是先辈们的信仰和对家族兴盛所寄托的愿望[5],也是闽南工匠技术走向海外的体现。

十九世纪中叶,随着吉隆坡发现大量锡矿,大量的福建南部移民前往马来半岛内陆

地区,在此过程中,他们在吉隆坡等地方建立许多会馆、寺庙等组织,构建起以闽南话为纽带的商业网络。雪隆福建会馆等社团的出现,标志着闽南移民由松散聚居到规范化联合。

3.2 物质遗存: 石雕、庙宇与建筑

闽南石雕是闽南文化对外传播的一个重要媒介,在东南亚各地的存在反映了这一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以及它所带来的影响。伴随着福建移民,闽南石雕技术及其产品已经传播到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等地[5],并且在当地成为一种地方性的文化遗产。这种文化传播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把当地生产的产品销往国外市场;另一种则是匠人出海,即直接在东南亚国家开展石雕的制作工作。

檳城是闽南石雕遗迹最集中的地区之一。这里有很多优秀石雕作品,例如龙山堂石雕大多用浅浮雕来表现神像,这些石雕都是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也反映了闽南石雕以写实为主的艺术特点。在吉隆坡也有很多闽南传统石雕作品,例如陈氏书院、天后宫等都保存了大量闽南石雕,这些地方不仅是人们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闽南人民文化记忆的物质载体。

3.3 非物质传承: 语言、信仰与节庆

作为一种闽南文化传播形式,在马来西亚,闽南语有明显的代际传承特征。在马来西亚的闽南话虽然受到一定的保护,但是其民间谚语、歌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传承却比较艰难。这也反映出整个海外闽南语传承遭遇到的困境:虽然在日常生活中还可以继续使用闽南语,但是其中所蕴含的文化正在慢慢消逝掉。

对此,马来西亚闽南人社团正在寻求新途径来传承与发扬闽南文化。2025年8月,首届马来西亚闽南语歌手大赛在吉隆坡举行,这是由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主办,在世界闽南语金曲盛典组委会指导下进行的。大赛旨在通过一首首闽南语歌曲,唤醒生活在海外的福建同乡对家乡的记忆,进而推动闽南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信仰仪式也是闽南文化传播重要组成部分。“送王船”是从闽南沿海地区流传至东南亚马六甲地区的民间信仰活动,表达了当地人对于海洋的敬畏之情以及和谐相处的态度。2020年,由中国与马来西亚共同申报的“送王船”项目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评定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6]。在此之后,中马两国在厦门举办了一场名为“共有遗产保护培训班”的交流会,在这次会议上中马双方专家学者和传承人就如何进行社群口述史研究,如何解决非遗保护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制定了初步合作计划。这也意味着闽南文化的海外传播已由单向传播转变为双向共建的全新阶段。

3.4 社团网络:从庆德会到晋江会馆

海外闽南人社团的发展史是一部文化传承的组织化实践史。而新加坡庆德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庆德会成立于1831年,是由36位土生华人创办,是新加坡最古老也是最大的一个华人互助团体,已有将近二百年的历史,在这期间无数泉州人把闽南文化带到新加坡,共同谱写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篇章。

作为马来西亚闽南人的一个重要团结组织,马福联在1957年成立之后不久就发展成为一个由超过200个分会组成的庞大社会团体,其会员遍布马来西亚各个福建会馆、同乡会等,是促进马来西亚当地闽南人之间交往交流的重要力量。除了负责组织各种传统节日活动以外,马福联也积极开展各项文化教育工作,推广闽南方言走向世界。“闽南文化走向东盟”系列活动[7],正是由马福联与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共同主办的,此活动大大提升了闽南文化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具有里程碑式的成就是,晋江会馆联合“说咱闽南话”App,在新加坡成立第一个“闽南语海外传习中心”。这个中心旨在打造一个集传承、学习、交流与传播为一体的综合型基地,并开展不同形式的语言文化教学活动,如互动课、亲子活动、专题讲座等。借助乡音拉近距离,给新加坡当地闽南籍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语言文化的场所,使传统的方言也能在国际化大都市重新焕发生机。

4. 闽南文化的海外演变:融合、挑战与创新

4.1 峇峇娘惹:文化融合的独特样本

作为闽南文化和东南亚当地文化的产物,“峇峇娘惹”的出现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峇峇”是出生生活在东南亚的华人男性的统称,“娘惹”是出生生活在东南亚的华人女性的统称。“峇峇娘惹”,是由从15世纪开始中国移民与当地土著妇女通婚而产生的一个特殊人群,也是由于这种婚姻关系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作为一种文化交流产物,峇峇娘惹文化在其语言、服饰、饮食以及建筑等方面都表现出了明显的融合性特点,在语言上,他们使用带有闽南语成分的马来语并发展出一种新的语言——“峇峇马来语”,在服饰上,则穿着结合中国刺绣工艺与马来风格结合的“可巴雅”上衣搭配纱笼裙装,在饮食上,“娘惹菜”是将中国的烹调技术和东南亚香料结合起来形成的独特风味的一种菜肴。

虽然峇峇娘惹文化具有一定活力,但是其传承仍然面临许多困难。由于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学习英语,所以一些传统的方言以及习俗已经慢慢被遗忘。近些年来,在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出现了一股“峇峇娘惹文化复兴”,以电影、展览、美食节等方式来重新认识以及发扬这种独特的文化。“峇峇回来了”系列活动,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

4.2 代际差异与传承危机

在东南亚,闽南文化代际传承断裂问题日益突出。在马来西亚,老一辈闽南移民还能用闽南话流利交谈,“70后”、“80后”也能正常沟通,“90后”大多只会说几句简单的日常用语,不太懂闽南语传统谚语或者民谣,“00后”普遍只能听懂而不会说。而在新加坡也有同样的情况,本地出生的年轻人对闽南语的了解已经大不如前。

这是由于多语言环境中语言竞争所导致的结果,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由于英语在教育以及工作方面占有优势,所以英语是主流语言,普通话则是华人群体中最常用的语言。但是相比之下,比如闽南话等地方性口音就很少被人提及,一般只会在家里或者小圈子中使用。年轻人更愿意用功能性强的英语和普通话进行沟通交流,从而也就减少了对方言的关注度。

文化认同代际差异是热点问题。老一辈闽南移民一般认为祖籍地是“原乡”,并且努力保存与家乡的联系;而年轻一辈由于生活在多种文化共存环境中,对于“祖籍国”的感情较为淡薄。如何让年轻人了解并且热爱自己民族文化、母语以及传统文化,是摆在闽南文化海外传承面前的重要任务。

4.3 当代创新:从音乐到数字化

面对传承困境,海外闽南社群也积极寻求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而音乐正是连接代际的一种有效方式。从2025年开始举办的马来西亚闽南语歌手大赛,就是利用音乐比赛的形式,吸引年轻人关注从而让其产生共鸣,

以乡音唤醒文化认同感。该比赛借鉴世界闽南语金曲盛典的举办经验,对于推进福建打造“世界闽南文化交往中心”的战略布局起到积极作用,在国际上也产生一定影响。

数字化技术为海外文化传播开辟新渠道。“闽南语海外传习中心”的经验告诉我们,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是值得学习。该活动利用“说咱闽南话”APP以及各种新媒体形式进行在线教学与研究,取得良好反响。结合传统会馆场地和手机等移动设备资源,这种模式对于海外地方语言保护起到良好作用,也对以后相关工作开展提供可被复制的范例。

学术研究是海外文化传播的重要支撑。2025年12月,第二届闽南文化海外传播高层论坛在厦门召开,有八十余名来自各界的专家学者参会,聚焦“服务‘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一主题进行交流。此次会议还设有研究生分论坛,希望年轻学子们用语言学、翻译学以及区域国别研究等方法,思考如何进行有效的文化传播工作。

5. 跨域再嵌: 闽南文化海外传承的机制重构与路径拓新

5.1 海外传承的结构性困境

以马来西亚为中心的,东南亚闽南文化的传承所面临的问题,并非由于缺乏相应的文化资源,而是由于传承模式和社会结构之间存在一种结构性矛盾[8]。

5.1.1 代际断裂与文化再生产的阻滞

闽南文化的代际传递具有明显的断裂性。老一辈移民把对文化的传承主要寄托于重建宗族仪式场所及保持闽南方言的纯粹上,在由英语、马来语、华语组成的三语环境里成长的新一代,他们对于文化的认知已经发生了变化。对于生活在多种文化之中第二代、第三代华人来说,闽南方言的作用已经被强势语言取代,他们的文化认同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感情上的怀念而不是实际生活中的一种行为[9]。

造成这种代际差异原因,是文化再生产过程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断裂。文化的代际传承需要家庭场域和教育场域共同发挥作用,“惯习”是人们内在化的一种行为方式,是文化传承心理依据,“文化资本”的不均等分配通过教育系统实现社会阶层再生产[10]。在马来西亚华人社区中,家庭场域中闽南语使用的空间不断减少,而在学校教育

场域中主要是使用标准华语以及英语,闽南文化缺少制度性再生产的途径。由此造成“听得懂不会说”的半语现象,其实是文化断层的表现。通过对闽、台、马、印四地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在这四个地方,马来西亚闽南话保护效果最好,但是谚语歌谣传承不足;而在内地闽南语中老年人熟练掌握,70后、80后能够流畅使用,但是90后大多只会说不会说,00后更是全部都会听但是不会说。

5.1.2 社团组织的功能困境

闽南籍社团是闽南文化海外传播的主要平台。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以及其下设200多个分会,是全世界最集中的闽南人社团群落。但是,在当今社会,这个社团群体也遇到了两大问题。

第一,传统功能的替代性衰退。早期闽南会馆所起的社会救济、职业介绍、纠纷解决等作用已经被现代社会由政府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管理所取代,在移民生活中失去实际意义,因而对年轻人不再具有吸引力。二战以后,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呈现“内聚型”和“外散型”的双重趋势:一方面地缘会馆出现跨区域的联合会;另一方面内部的小团体纷纷独立成立自己的团体,显示了社团内部权力的分离[11]。

第二,组织定位模糊。在政府主导的文化交流活动中,海外社团一般被视为“助手”、“执行者”,未能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动性文化创造力,在社团活动中呈现出雷同模式:春祭秋尝、周年纪念等成为既定程式化内容,缺少面向年轻人的新颖文化产品。这实际上是对社团由“内生型互助团体”变为“外驱型联谊场所”的过程中的角色失位。由于华人代际变化,以家乡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会馆逐渐衰落,整体上华人群体处于一种动荡之中。

5.1.3 数字化传播的表层化问题

数字化手段对海外文化传播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目前来看还处于初级水平。“说咱闽南话”App等数字化探索只是实现了文化的数字化保存以及单向传播,这虽然扩大了文化传播范围,但是并不能解决文化传播所面临的根本问题。

目前,数字化实践中忽略了媒介技术对文化本身的影响。在信息时代,网络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元素,网络化逻辑蔓延改变生产和经验以及权力和文化的运作方式及其效果

[12]。数字媒体不是简单的传播工具，而是意义生产场所。海外年轻人已经完全接受短视频、互动游戏等形式，静态数据库模式不能激发其文化认同感。如果数字化只是为了“保存”，而不是“再生产”，那么它就无法解决由于地理间隔以及文化差异所带来的认同分裂。网络社会的最大特点是“流动的权力优于权力的流动”，而在互联网上，“在场”或“缺席”对个人和社会关系起决定作用[13]。因此，对于海外闽南青年来说，如果不能在网络世界中获取有意义的闽南文化的存在，那么他们就会产生文化疏离感。

5.2 多元主体协同的治理机制构想

突破上述困境，要从单向传播的传统模式里跳出来，构建起一种可以激发多方主体积极性以及主动性的协同治理机制。也就是要形成，把价值共识当作核心，把功能分工当作框架的多元共治的模式。

5.2.1 治理理念：从文化输出到价值共生

长期以来，闽南文化的海外传播被纳入“中华文化走出去”这一政策范畴之中，而其中所隐含的一个前提就是将海外华人社会视作文化的接受者。这种“中心—边缘”的传播模式，忽略了如马来西亚等地闽南文化的本土化进程所具有的主体性价值。峇峇娘惹文化的产生并非是对原乡文化的背离或者贬低，而是闽南文化在外来文化背景之下的一种积极主动地调整与融合[14]。这一点被认可，则要求我们要改变以往单方面的传播思维模式，转变为一种互动交流的态度，由文化传播转变为价值共享。

5.2.2 主体结构：政府、社团、学术与市场的功能耦合

多元共治的关键是厘清各方角色以及彼此间的关系，进而形成“一核三翼”的分工合作模式。

“一核”指价值观层面。“闽南文化的在地融合”，是对其海外落地生根活动进行的一种概括总结，把它们放在闽南文化发展大背景中去看，消除原乡与异乡区分。

“三翼”指操作层面。第一翼是政府，在职能上应该是引导者而不是领导者。也就是说政府资金应该主要用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平台搭建上，比如建立种子基金，打造跨国文化交流平台等，而不是直接参与文化建设工作。第二翼是学界，在职责上要对文化进行系统的梳理以及当代转化，例如大学和研究机构要把学术成果变成可以供当地社团使

用的课程、教材或灵感。第三翼是市场，在功能上是要带来持续盈利模式，推动文化科技企业和文化创意设计公司协助闽南文化商品化。

5.2.3 运行逻辑：赋权在地主体的自治能力

多元共治良好运转，前提是海外当地社团自身能动性能否充分发挥。目前体制下，海外社团作用更多是作为“承办方”、“接待单位”，而自身组织活动能力和文化传播能力并未被充分利用。需借助项目资助、能力建设培训等手段，让海外社团有权利成为文化传播策划者及实施者。只有当地闽南人由“被组织表演”转变为“自己导演”，才能真正实现世代相传。

5.3 基于在地需求的路径选择

5.3.1 轻量化文化生产：面向青年世代的趣缘激活

代际断裂的根本原因在文化形态上是传统与青年文化的隔阂，在文化消费上是传统与青年文化的脱节。要化解这种困境就要摒弃自上而下的宏大叙事的说教方式，采用零碎化、娱乐化的方式让青年接触传统文化。

例如，开展面向东南亚华裔青少年的“闽南文化IP孵化计划”，支持创作以送王船传说、下南洋历史为主题剧本杀和解谜书；或者利用新加坡闽南语传习馆，推出以当地生活环境为主题的“生存闽南语”系列短视频课程，用实用性吸引大家来学。闽南方言在马来西亚既有工具性、资源性作用也有遗产性意义，在槟城福建话仍然十分活跃，是槟城福建文化的标志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15]。这说明强调闽南语当地实际应用价值的同时突出它的文化价值，是激发年轻人学习兴趣的可行办法。

5.3.2 沉浸式技术应用：重构跨时空的文化在场感

数字化传播应由浅层存储到深层次沉浸。随着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的发展，已经可以克服地域限制再现文化的在场感[16]。在泉州开元寺数字化保护项目中，利用近景摄影测量法进行三维重建，可使文物得到高保真数字化保存，有利于之后的VR应用以及元宇宙构建[17]。

建议开展“数字龙山堂”试点工作。以槟城邱氏宗祠龙山堂为例，利用3D扫描技术对整个祠堂及石雕进行全方位扫描保存，同时结合相关文献资料还原不同年代宗祠样

貌。龙山堂邱家起源于 1851 年, 现有主要构造是 1906 年再建, 该建筑兼具闽南传统祠庙以及殖民地时期洋楼元素, 在槟城所有祠堂中具有很高艺术价值, 其中大量精美木雕、石雕均为中国人雕刻。海外出生第四代华人使用 VR 头盔进入数字复刻版宗祠后, 可以自主浏览建筑内部结构, 也可以听到由人工智能语音合成长辈叙述家族迁徙经历。这种感官沉浸式的体验, 可有效弥补物理在场缺席导致的情感疏离。

同时, 闽南文化数字资源库也需吸纳马来西亚当地社团提供的活态资料——如吉隆坡天后宫诞辰实录、马六甲送王船仪式影像等, 使海外群体也成为数字资源的创作者而不是仅仅作为消费者。

5.3.3 双向研学机制: 从文化寻根到知识共建

目前的文化交流具有单向性——海外华裔青少年来华寻根, 国内学者出访国外考察等。而这种做法又存在一种“原乡是文化的发源地、海外是文化传播的目的地”的固定思维, 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双方互动的合作精神。

提出构建双向、对等的研学模式。一方面, 支持中国的高校闽南文化研究方向的研究者把马来西亚的会馆作为海外的田野调查点进行调研, 研究的问题应是贴近当地社区的需求——例如百年会馆的新媒体运营方式以及如何让峇峇娘惹文化活起来等问题, 而研究结果也应及时反馈给当地的社团作为其决策时的参考; 另一方面, 在世界闽南文化节上举办“峇峇娘惹与原乡”的对话沙龙, 邀请来自马来西亚的娘惹菜师傅与中国的闽南本地烹饪师傅一起切磋技艺, 开发新的菜品。这正是文明互鉴最真实的体现。

轻量化生产满足年轻人需要, 沉浸式技术让文化“到场”, 双向研学促进知识共建, 三者都围绕着一个主题: 那就是只有承认海外闽南文化的主体地位, 把当地社区由被传播者转变为传播者, “世界闽南文化交流中心”才能够从文件变成行动, 闽南文化的全球共融也才能够从概念变为事实。

6. 从地方文化到文明互鉴

回顾闽南文化走向世界的历史过程, 可以看到一条一以贯之的发展脉络: 从宋元时期开始借助贸易交流得到传播, 到明清时期因为移民得以流传, 最终在现代依靠制度交流来扩大影响。在整个过程中, 闽南文化始

终保持“双重特性”: 一方面拥有坚守传统的坚定意志, 另一方面又具有兼容并蓄的心胸。正是这一特性, 使闽南文化成为连接中国和世界的关键纽带。

闽南文化的现代化经验表明, 现代化并不是对传统的全部否定, 而是使多样的传统找到属于它们的未来[18]。当今全球化持续深入发展, 闽南文化所面临的不是“非此即彼”的封闭或者开放的简单二元选择, 而是要在坚守之中实现创新, 在融合之中寻求发展的一种辩证的路径。

展望未来, “世界的闽南文化”将在三个不同层面彰显其价值所在: 于海外的闽南人群体而言, 它是身份认同的文化本源; 就中国而言, 它是维系华侨华人情感的桥梁; 而在世界维度上, 它是文明相互学习借鉴的鲜活实例。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送王船”联合保护所昭示的, 源自地方的文化遗产, 可以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

闽南文化在马来西亚的实践说明, 地方文化的全球化并非简单的单向文化输出或同化, 而是在资本流通, 代际冲突以及国家政策中, 一个持续进行“文化再生产”的动态过程。这一个过程不只是重塑了东南亚华人的身份政治, 也为了解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范例。

7. 结论

闽南文化的海外传播, 揭示其“双重特性”——坚守乡族认同与开放融合异质——构成的深层韧性, 使文化在异域并非单向复制, 而是完成在地化再生产, 形成峇峇娘惹等独立演化形态。面对代际断裂与社团功能转型, 音乐赛事、数字平台与跨国申遗等创新实践虽提供新可能, 但传承的根本在于让传统文化在青年世代的生活世界中重获意义。闽南文化在东南亚的历程展现了非对抗性的文明互鉴范式, 其价值超越地方性, 成为全球化进程中地方文化保持活力并参与世界对话的典型样本。

参考文献

- [1] 林华东. 根深叶茂: 从中华文化到闽南文化——《闽台与海丝文化研究丛书》总序[J]. 泉州师范学院学报, 2015, 33(01): 1-3.
- [2] 黄俊, 李超. 布尔德厄文化再生产理论导论[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195.

- [3] 徐晓望.闽南史研究[M].海风出版社, 2004.
- [4] 俞驰韬.阶级政治、族群分裂与族群间关系——以马来西亚的族群政治为例[J].东南亚研究, 2025, (06): 25-49+154-155.
- [5] 陈静.跨洋遗珍: 东南亚地区闽南石雕遗迹的历史脉络与文化记忆[J].天工, 2025, (19): 8-11.
- [6] 刘计峰, 蒋滨韵.华人信俗、国家文化与跨国遗产: 马来西亚马六甲送王船的意义再造[J].西北民族研究, 2025, (03): 103-114.
- [7] 武治国.中国“和”文化与世界文明共生[J].人民论坛, 2019, (23): 140-141.
- [8] 胡选宏.出版“双重属性”如何“一起摇摆”?[J].出版发行研究, 2016, (12): 9-11+22.
- [9] 洪丽芬.试析马来西亚华人母语的转移现象[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8, (01): 32-41.
- [10] 黄俊, 李超.布尔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导论[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195.
- [11] 黄子坚, Danny Wong Tze Ken, 宋燕鹏.书写马来西亚华人史——新趋势和跨过两种语言圈之间的隔阂[J].南洋资料译丛, 2022, (01): 69-80.
- [12] 曼纽尔·卡斯特, Manuel Castells, 卡斯特, 等.网络社会: 跨文化的视角[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 [13] 宋辰婷.互联网时代的权力演化趋势[J].社会科学研究, 2017, (02): 106-112.
- [14] 梁明柳, 陆松.峇峇娘惹——东南亚土生华人族群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 2010, (01): 118-122.
- [15] 王晓梅.闽南方言在马来西亚的传承、发展与价值[J].语言战略研究, 2025, 10 (02): 15-22.
- [16] 徐敬宏, 郎冉.作为传播场景的元宇宙: 数字集成时代要素升维与体验变革[J].中国出版, 2023, (02): 36-41.
- [17] Eugene CHNG 庄以仁, 基于博物馆馆藏的中国文化教育虚拟现实系统开发的关键技术研发及实践.浙江省, 宁波诺丁汉大学, 2019-06-12.
- [18] 王铭铭.“世界闽南文化论坛”学术小结[J].西北民族研究, 2015, (03): 60-63.